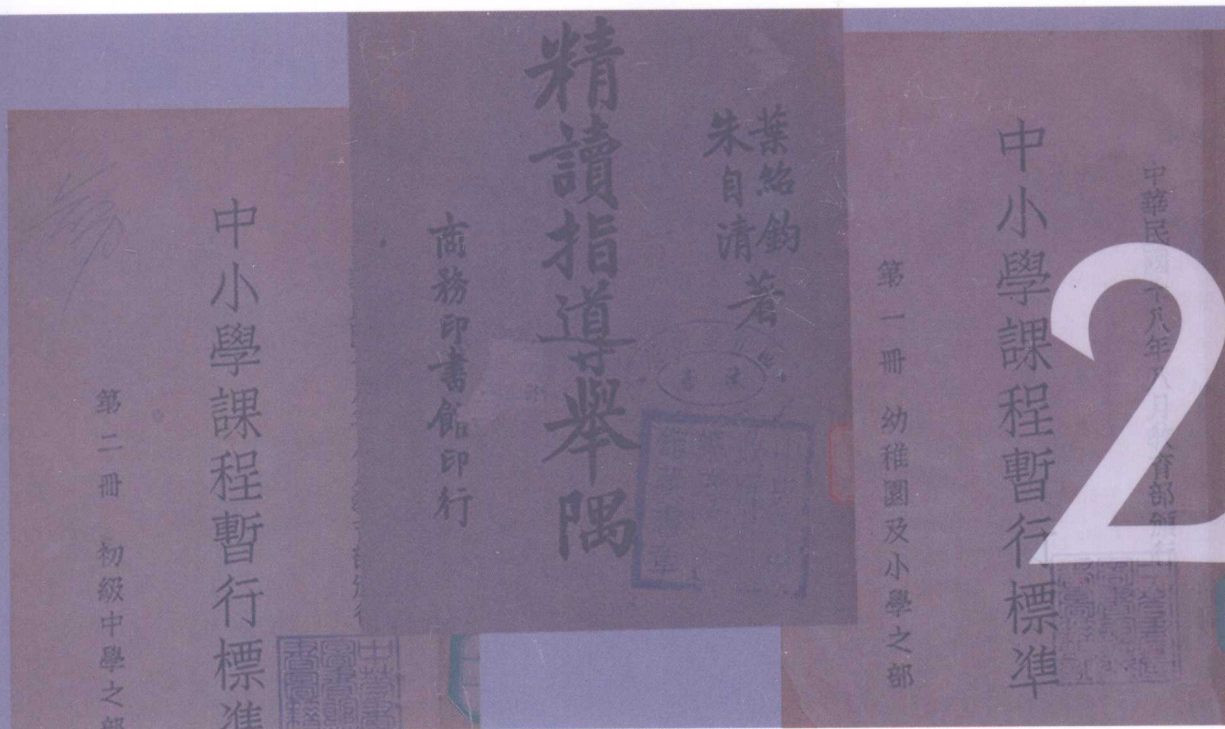


母语教材研究

A Study of First Language Textbooks

洪宗礼
柳士镇
倪文锦

主编



母语教材研究 (2)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

主 编 洪 宗 礼
柳 士 镇
倪 文 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语教材研究. 2/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43-8301-4

I. 母… II. ①洪…②柳…③倪… III. 母语-教材-研究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157 号

- 书 名 母语教材研究(2)
主 编 洪宗礼 柳士镇 倪文锦
责任编辑 汪志虹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 28 号(邮编 215557)
电 话 0512-52391383 52361778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总 印 张 306
总 字 数 5 816 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301-4
定 价 700.00 元(共 10 卷)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母语教材研究》集中了国内外160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研究中国百年和世界40多个国家及地区当代的母语课程教材（含全球8大语系26个语种），是迄今参与人数最多、研究范围最广、成果最为卓著的多卷本母语教材研究专著。该书为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九五”、“十五”重点课题的终结性成果和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的重点图书。

回顾与总结 卷一 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的演进

卷二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

卷三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评介

卷四 中国百年语文教科书课文选评

译评与借鉴 卷五 外国语文课程教材综合评介

卷六 外国语文课程标准译介

卷七 外国语文教材译介

卷八 外国学者评述本国语文教材

比较与创新 卷九 语文教材编制基本课题研究

卷十 中外比较视野中的语文教材模式研究

顾明远 这一课题研究填补了我国语文教材研究中的空白，不仅丰富了教育科学研究宝库，也对我国当前课程改革起到借鉴、推动的作用。

朱慕菊 这项课题拓宽了母语教育研究的视野，它的发展与创新，体现了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袁振国 这项研究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钟启泉 该课题研究既有广阔的国际教育的视野，又有本土改革实践的情怀，堪称21世纪初我国语文教育课程创新的奠基工程。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摘录）

光绪二十九年（1904）

第四节 初等小学各科目教育要义如下：

二、读经讲经 其要义在授读经文，字数宜少，使儿童易记。讲解经文宜从浅显，使儿童易解，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每日所授之经，必使成诵乃已。

凡讲经者先明章指，次释文义，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儿童苦其繁重；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尤不可务新好奇，创为异说，致启驳杂支离之弊。至于经义奥博无涯，学堂时刻有限，止能讲其大义；若欲博综精研，可俟入大学堂后为之，此乃中小学堂讲经通例。

现在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

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

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

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

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

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除《孝经》（二千零十三字）、《四书》（五千九百六十七字）全读外（共六万一千六百字），《礼记》最切于伦常日用，亟宜先读。惟全经过于繁重，天资聪颖学生可读江水《礼记约编》（约七万八千余字），其或资性平常，或以谋生为急，将来仅志于农工商各项实业，无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礼记约编》择初学易解而人道所必应知者，节存四万字以内，俾得粗通礼意而仍易于毕业。其讲解用近人《礼记训纂》最好，如不能得，或用相台本郑注，或暂用通行之陈祖康说均可。缘所读所讲，止系切于人生日用之事，无甚精深典礼，则古注与元人注无大异同。

上表所列读经讲经时刻，计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六点钟，合共十二点钟。另有温经钟点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若学堂无自习室，则即在讲堂督课。

三、中国文字 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

· 5 ·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1904年）

奏定中学堂章程（摘录）

光绪二十九年（1904）

学科程度章第二

二、读经讲经 学生年岁已长，故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以备将来学成经世之用。讲读《左传》应用武英殿读本，讲读《周礼》应用通行之《周官精义》（其注解系就钦定《周礼文疏》摘要节录，最便初学寒士）。此两书既本古注，又不繁冗，最于学者相宜。讲《左传》宜解说其大事与今日世界情形相合者，讲《周礼》宜阐发先王制度之善，养民教民诸政之详备，与今日情形相类可效法者；但解说须简要。

讲经者先明章旨，次释文义，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儿童苦其繁重；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尤不可务新好奇，创为异说，致启驳杂支离之弊。至于经义奥博无涯，学堂时刻有限，止能讲其大义；若欲博综精研，可俟入大学堂后为之。此乃中小学堂讲经通例。

现在所定读经讲经钟点，计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三点钟（间日背讲一次），合共九点钟；另有温经钟点，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

因学生皆系高等小学毕业者，故应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每日读二百字，每年除各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应读四万八千字，五年应共读二十四万字。计《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周礼》全本（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合共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黄叔琳《周礼节训本》（约二万五千字）则合计不过二十一万余字，尚有余力温习。

三、中国文字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独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御选古文汇纂》最为

· 26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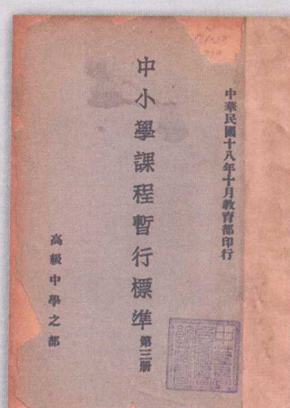
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



小学国文课程标准
(1929年)



初中国文课程标准
(1929年)



高中国文课程标准
(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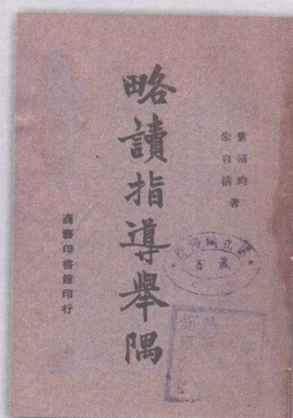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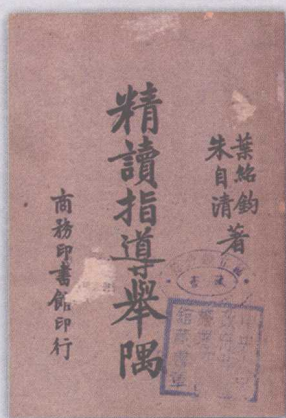
初等小学国文教科
书教授法(蒋维
乔 190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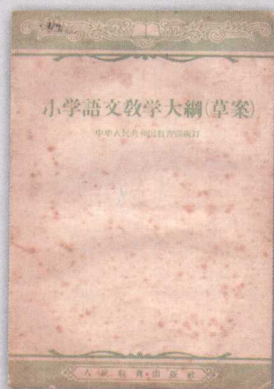
文字源流参考书
(张之纯、庄庆祥 191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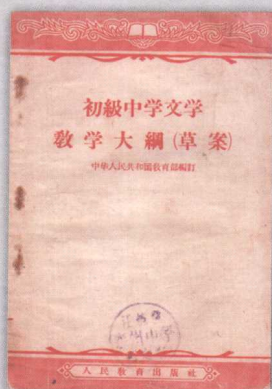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史参考书
(王梦增 191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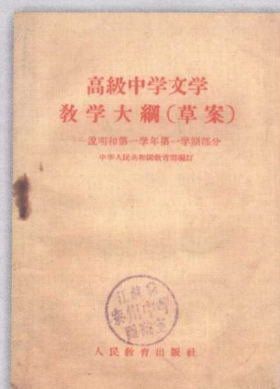
精读、略读指导举隅 (朱自清、叶绍钧 194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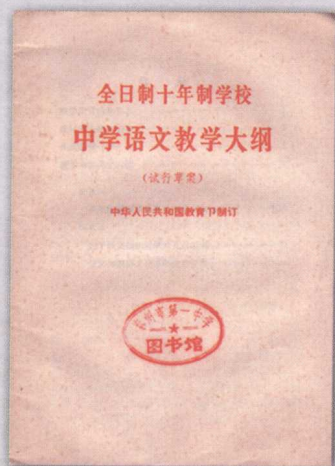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195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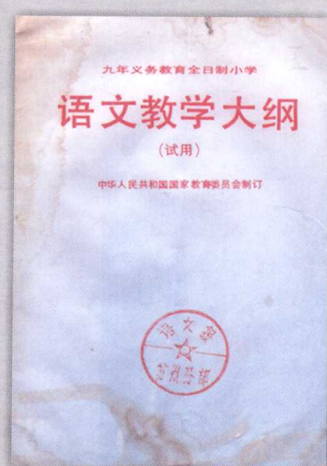
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
(195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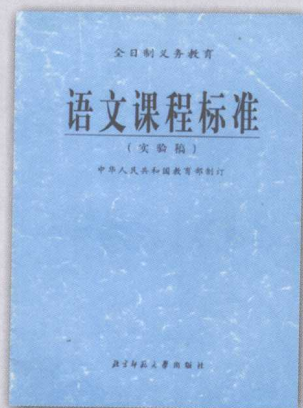
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
(195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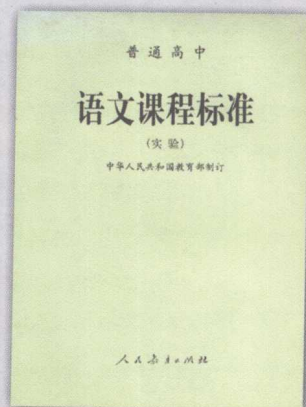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
语文教学大纲(1978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
语文教学大纲(1992年)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01年）



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2003年）



建国后张志公等专家研究语文教材的著作

本卷导论

关于教材广义的定义是,教材是教师在教学行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它既包括最标准的教科书,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图书教材、视听教材、电子教材等等。其中,教科书是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教材。本书所采用的语文教材的概念是指语文教科书。

我国近现代的语文教材是在古代语文教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虽在夏、商、周时期就已有学校教育,但是没有单独的语文学科,语文教育是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自然的百科教育等融合在一起的。当时的学校教育,是把德、才、学、识、能等都纳入“四书”、“五经”、“六艺”及蒙学等教材中。从不同的视角看,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但经学教材、蒙学教材、文选教材、诗选教材作为古代语文的主体教材则是确定无疑的。

经学教材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的必修教材。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即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到了宋代,又增添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必修教材。于是,“四书”、“五经”作为一套完整的学校课程的教材体系被一直沿用到清末。如果说“四书”、“五经”是经学教材的典范的话,那么,我国古代也不乏以识字为主的蒙学教材,早期的,如周秦时期的《史籀篇》、《苍颉篇》,两汉时期的《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等;后期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清代的《文字蒙求》等。作为蒙学教材的代表,一方面,“三、百、千”等在我国语文启蒙教育中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们作为教材各自的个体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发挥的是整体的优势。另一方面,从学科体系看,为初级阅读打基础的识字教材,它们与文选教材、经学教材的关系,体现了古代语文教材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联系。文选教材的代表,最早是梁朝昭明太子所编的《昭明文

选》，后有宋代的真德秀所编的《文章正宗》，以及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等。这种文选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一种主要模式。而以《唐诗三百首》为代表的诗选教材，也在我国古代的语文教学，尤其是启蒙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我国封建教育的解体，学校逐步实行分科教育。众所周知，学科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是学科教材编写的依据，学科教学实施的依据，也是进行学科评价的依据。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作为语文教材编写的依据，它是影响我国现代语文教材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从我国语文教材编制思想的变革进行考察，20世纪以来，以下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对我国近现代语文教材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前期的有：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文件中的语文教育法令，1923年的《新学制语文课程标准纲要》，1929年的《国语国文暂行课程标准》，1941年的《六年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20世纪后期的有：1956年、1963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2年和1996年的语文教学大纲；还有进入新世纪后，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两个实验的语文课程标准。此外，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的语文课程标准（纲要）对语文教材编制的规定也反映了各自的地方特色。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语文开始独立设科。这是我国语文近代化的标志，意味着语文学科开始创建自己独立的教学体系。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仍然是语文学科的根本目标。所谓“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又所谓“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①。因此，就教材内容而言，清末的语文教材并无实质性变化。封建伦理道德目标是封建政治建构的产物，它也只有随着封建政治的解体才能解体。尽管如此，清末的教材编制仍有一些新的特点值得注意，如对传统的文选型教材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以清末流行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学国文读本》（林纾编，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和《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吴曾祺编，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为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按照教学的需要，以每个学期或每个学年为单位分册、分集编写；选文的编排不按传统的文选型教材由古而

^①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见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78、83页。

今、由远而近的次序进行,而是采用先今后古、由近及远的逆向编排方式,使学生先读思想、生活与现实贴近的清文,然后逆溯而上,最后至周秦汉魏文。尤其是吴编本,不仅“史”的线索清晰,而且编写体例更具特色,即在每集之前有例言一编,综述文学渊源、文章优劣,颇有独到之处。这是语文教材中编入语文知识的雏型。

民初,伴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蔡元培提出取消读经科,推行新教育,培养个性自由发展的人被提到议事日程。按1912年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及之文,兼课习字”。按这样的规定,当时的教材编制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以谢无量(蒙)编的《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出版)、《国文教本评注》(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影响为大。它突破了旧式文选型教材单纯以时代为序的“直线式”编排的老套路,兼顾时代先后及文字深浅的两个方面,并尝试以文体分编的新体制。如教材第一册共分五编:第一编论著之属,第二编序录之属,第三编书牋之属,第四编传志之属,第五编杂记之属。这里的“编”是大单元,它虽然不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单元,但已清楚地显示出组元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创了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以单元组织课文的先例。同时,较之先前的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助读系统明显得到扩充,增加了诸如题解、作者介绍、注释和夹评夹注等内容,旨在帮助学生阅读,领悟文章作法。

五四运动前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时代潮流猛烈地冲击着旧文化的堤坝,也为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大批新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材,并居于主要位置,语文教育实现了整体上现代性目标的转换。一方面,历史上那些具有进步意义和民主、平等价值取向的经典被重新阐述,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劳工神圣、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潮不仅解构了封建教育伦理道德,为语文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内容,而且又以一批白话文学作品建构了崭新的现代语文教育内容。该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制文选型语文教材,如洪北平等编的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是专选现代白话文的教材,它开用现代白话文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先河。又如孙俚工、沈仲九合编的初中用《国语文读本》(民智书局1922年出版),专选现代人写的白话作品,又重在文艺,颇有特色。此后出现的多种语文教材,也一改旧式文选型教材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代之以白话、文言分编或混编的格局,标志着白话文正式占领了中学语文教材。同时,上述教材也选录了许多反映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白话作品,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讲演、论文等,使当时的新式语文教材充满了时代气息。还有一些优秀的外国译作,如都

德的《最后一课》等,也都首次入选教材。在反映女性题材上,冰心、陈衡哲等女性作家的作品被选入了教材,塑造了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独立性强、追求平等、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新形象,如鉴湖女侠秋瑾等(《吊秋瑾诗》,《新时代国语教科书》,1927年)。在文体方面,新制语文教材也开始走向通俗化、平民化。上述清末吴曾祺编写的《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基本上延续了《文选》的传统,选文涉及的文体达三十多种,其中反映封建关系及蕴含旧伦理道德规范的特殊文体,如墓志铭、祭文、吊墓表、表、谏、疏、铭箴、颂、赞、刻石、檄、诏等文体几乎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的比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许多反映封建关系与旧伦理道德的文体因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而被抛弃,与此相反,一些反映现实生活追求的新文体进入语文教材中,除了白话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以外,社会调查、时事评论、小品、日记、书信等也开始进入语文教材。

应该指出,白话语文教材的出现,在当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简单变更,或是新文化的象征,它同样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需要。如果说在新式教育萌芽之际,肤浅的科学知识尚能借助文言加以传播,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急剧增长,文言的消极阻碍作用便日益明显了。因此,白话语文教材的诞生使“言”、“文”长期分离的语文教学进入了言文合流统一的新时代。这一方面显示出教材语言与学生口语接近,易为学生所接受,同时也反映了教材编写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

该时期语文教材的另一突破是,作业系统已开始作为教材的一个结构要素被编进教材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近现代语文教材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从选文的角度看,教材已由只选传统的名家名篇发展为既照顾到传统名篇,更注意选用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的优秀文章。

第二,从课文的编排方式看,教材已由传统的按时代为序的“直线”式发展为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圆周”式。

第三,从课文的组合形式看,教材已由孤立的单篇文章的堆砌罗列发展成按照一定的教学要求,具有一定联系的单元组合。

第四,从编辑意图看,那种只重文学教育、文艺欣赏,轻视或忽视语文应用的传统教材观已受到冲击,而研究规律、兼顾文学性与实用性并以实用为主教材观已初露端倪。

第五,从结构成分看,教材已由单一的范文系统发展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作业系统和助读系统的综合系统。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

革命的开始。解放初期,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规定,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教材方面,早在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审订中小学课本时,决定废除“国文”、“国语”的名称,统一称为“语文”。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当时对语文的认识,带有指导性的意见是“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一种斗争武器”^①。就语文教材的编制而言,当时基本上是以老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为蓝本进行编写的,同时也吸收了旧中国国统区的进步文人语文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改革的重点是在政治内容方面,强调彻底清除国民党统治时期语文教材中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注重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

50年代中期,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语文教材也随之分为汉语、文学课本。当时虽然大纲对汉语和文学的定位是“对年青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但具体的教材编制仍很有特色。语文实行分科教学,不仅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也是我国语文教材史上对传统的文选型语文教材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以初中汉语课本的编排系统来说,第一学期先复习小学的汉语知识;之后简介汉语课程概要,使学生初步了解什么是语言,为什么要学习语言,要学习哪些语言;其余时间则学习语音。第二学期学习文字和词汇。第三学期先了解词法、句法概略,然后系统学习词类。第四学期学习单句。第五学期学习复句,再系统地总结标点符号的知识,并对学过的语法知识作一次总的复习。第六学期学习修辞的基本知识。由此可见,汉语教材完全是按语言学的知识系统编写的。换句话说,语言学知识的“序”规定了汉语教材的“序”。

再以初中文学教材的编排系统来说,编入课本的课文有两类:一类是文学作品,一类是文学常识和作家介绍。各年级的内容作如下排列:一年级,着重选编描述各种事件、人物、风景的作品,作品内容力求涉及生活的各方面,尤其注重青少年的生活。教材原则上根据思想内容组织单元。二年级,注重选编历代著名的文学作品,比较深入地反映人物的精神面貌,并按作家和作品年代的先后排列,使学生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大致地了解。三年级,选编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主要的文学体裁,并大致按作品年代的先后排列,教材依体裁分类组织单元。每学年的教材采用圆周循环的排列方法,形成两个圆周。

高中文学课本由三方面内容组成,即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和文

^① 董纯才《改革我们的中学国文教学》,《人民教育》1950年第2期。

学理论基本知识。其编排系统是:中国文学(含少数民族文学)是按文学史的分期,结合作品讲授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基本知识。高一先是秦代以前的文学和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再是唐代和宋代的文学;高二先是元代到五四的文学,再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外国文学作品:高三先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再是以苏联文学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文学理论基本知识则是选读经典性的文学论文,另外结合专题中的作品讲授文学理论基本知识。

由此可见,从语文教材的编制看,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材为解决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为探索语文教材科学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突出的优点是:第一,在体现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汉语学科体系和文学学科体系,使语文教学开始走上有序的轨道。第二,选文典范,以名家为主。名家名篇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胜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一套课本。第三,加强了系统的语文知识教学,有助于克服重“道”轻“文”的倾向。不仅汉语知识完整,文学理论常识和文学史常识也比较丰富。但这套教材也存在不少缺陷:一是文学教材分量过重。课本文字深,课文长,篇数多,对学生掌握作品及文学知识的要求偏高;而对字、词、句训练的要求注意不够,忽视一般读写能力(包括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培养。二是没有解决好读写结合的问题。汉语、文学、作文相对独立,自成系统,没有相互配合的具体措施,因此导致读写脱节。三是汉语教材内容比较繁琐。语音、文字、词汇等要学三个学期,第四学期才学单句,与学生的言语实践脱节。而且学习内容单调,不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的基础教育开始确立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则。1963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等各科教学大纲,并于1963年秋季开始实施。与以往的大纲相比,1963年大纲的发展是明显的,它对该时期乃至以后新时期的语文教材编写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为例,其主要发展在于:

第一,大纲开宗明义,强调“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突出语文的工具性,这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

第二,大纲规定了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纲提出要选文质兼美的范文让学生精读,要以讲读教学为中心,加强语文的基本训练,反对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或文学课,主张语文教育中“文”与“道”不可分割。

第三,大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初高中阶段阅读和写作的具体要求。

第四,大纲要求选材面广、量多、文质兼美。

第五,关于教学内容的安排,大纲强调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顺序为主要线索,组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体系。具体表现为:(1)从阅读内容比较单纯、篇幅比较短的文章到阅读内容比较复杂、篇幅比较长的文章;(2)逐步理解和掌握写作的基本方法,从词句到篇章,从比较单纯的方法到比较复杂的方法;(3)逐步理解和掌握记叙、说明、议论等主要的表达方式和常用的几种体裁的文章的写法。

新编的语文教材除了坚持大纲所规范的选文标准以外,还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根据训练的重点组织课文。教学内容以文章为主,建立了由一般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文言文递升到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文言文的读写教学体系。

第二,配合课文编写语文知识短文。简要介绍语法、修辞、逻辑等知识,这是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辅助手段。知识力求简明扼要,切合实用,以练习为主。

第三,按照训练要求编写各种练习题。练习包括识字写字、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基本训练。根据我国语文教学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练习题的内容侧重于多读多写和适当背诵。

第四,单元组织根据明确的教学要求,力求重点突出,又灵活多样。

但1963年大纲强调的“课文讲读教学”具有面面俱到的倾向,因而据此编写的语文教材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细大不捐、头绪纷繁的弊端。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语文教育开始由逐步复苏而进入改革发展的快车道。新时期的大纲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1978—1986年的大纲,这是义务教育实施前语文教材编写的依据;二是1988—1992年两个义务教育大纲和1996年的高中大纲,这是20世纪末义务教育及义务教育后的语文教材编写的依据;三是新世纪的课程标准,这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教材编写的依据。

1978—1986年的大纲继承了1963年大纲的基本精神(尤其是1978年大纲可以说是以1963年大纲为蓝本制订的),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全面地拨乱反正,尽快结束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促使语文教学回归“文革”前书声琅琅、井然有序的轨道。从总体上说,该时期大纲将语文学科定位于基本工具(基础工具),并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教材编写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课文应当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读写训练的安排,应该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在各年级有一定的重点。形成了初中侧重记叙文和说明文,高中侧重议论文和复杂的记叙文,以及古代作品初中以文章深浅为序,高中以时代先后为序的编制特点。课文开始分基本篇目与非基本篇目。(2)注释要针对不同的年级特点和课文

特点,详略得宜,深浅适度。思考和练习要多样化,富于启发性,注重实效,编配要有计划,前后要有联系,要同课文紧密结合,同作文教学相互配合。(3)语文知识力求精要、好懂、有用。在教材的编排体系方面,尤其是1987年版的语文统编教材,形成了以能力训练为序的较为严整的体系。如初中教材,从纵向说,贯穿六册书的线索有四条,即阅读训练、作文训练、听说训练和基础知识;而高中教材贯穿六册书的线索则有五条:读写知识和能力训练、听说知识和能力训练、文学鉴赏知识和能力训练、文言文阅读知识和能力训练、现代汉语的重点知识和能力训练。从横向说,每个年级的语文基本能力和基本知识的教学要求和内容就是一个层次,六个年级就是六个层次。这样纵横交叉,构成一种网状结构。而交叉点,就是单元。

1988年和1992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继续突出语文学科的“基础工具”性质,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坚持语文训练与思想教育(1986年大纲已开始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改为“思想教育”)统一的原则。在教材编制上,强调发挥课文的“凭借”功能。课文要文质兼美,难易适度,适合教学,题材和体裁应该丰富多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重视选取反映建国以来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同时也可编选少量乡土内容的课文。对基本课文,大纲一方面强化了它的“奠基”作用,即突出它“是各种初中语文课本的共同课文”,另一方面则规范了量化的要求。在文、白比例方面,大纲也给予明确的规定:现代文占80%左右,文言文占20%左右。

与以往的大纲相比,1996年高中语文大纲在强调语文工具性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语文的文化性:“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强调通过语文教学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对提高民族素质的意义。

由于1996年高中大纲的课程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原来单一的学科类课程发展成由学科类课程和活动类课程组成,并且,学科类课程又分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这些都直接导致语文教材编制的类型和模式有所变化。

课文是教学的范例,训练的凭借,也是使学生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依据。根据这一原理,1996年大纲对课文——即教材的主体部分做出了新的诠释:课文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选文(名家名篇、优秀时文等)和基础知识、能力训练的短文。对选文要文质兼美这一内涵也作了新的开拓,倡导在用词、造句、布局、谋篇、文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同时,强调作品的题材、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以中国现代作品为主,兼顾中国古代和国外的作品,难易适度,利于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已确立了在统一基本要求